

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 西方学者的视角

任远喆

摘要 从2009年开始,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南海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地区安全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解读表明,此轮南海问题研究起因于中国崛起、美国战略调整、能源安全等三大因素。其主要议题及方向集中在制度建设、法律途径、危机管理机制及中国角色等四个方面。为应对挑战,加强对话与交流,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要积极提出新主张,构建南海研究的“中国话语”,帮助推动化解当前的南海困局,寻找南海问题走向和平合作解决的新方向。

关键词 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研究 西方视角 地区安全

南海问题涉及中国和其他声索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秩序建构和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战略走向,涵盖了历史、地理、法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一直是国际安全战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南海问题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繁荣期”之后,2009年以来更是持续升温,国际学术界^①召开了一系列以南海问题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著作、文章和政策研究报告。毋庸置疑,这些以学术研讨相标榜的成果和活动有着各种或明或暗的现实动机,与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多有不同,甚至相去甚远,其实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和介入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斗争和博弈,然而,正是为了在南海问题的发展变化之中正本清源、坚定立场、争取主动,才更需要客观、全面地了解海外特

* 任远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北京100037)。

** 本文是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成果,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① 在本文中,“国际学术界”主要用以特指欧美日澳等国的南海问题研究“共同体”,尽管也与近年来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发起和组织的南海问题研讨活动有关。其实,南海问题虽然尖锐敏感,且正在吸引更多学者和学术资源,但研究者仍然相对有限。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本文一般不涉及南海周边国家学者的相关政策分析和学术研究。

别是西方学者^①的视角和观点。而且,为了在国际上发出我们的声音,澄清我们的立场,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我们也很有必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交流,甚至不排除激烈的交锋。

不难理解,西方学者更倾向于把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南海问题会重新成为西方地区安全研究的一个热点?此轮国际学术界有关南海问题的研究又具有哪些新特点?这些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南海问题研究的兴起及传统研究路径

国际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探查和发现,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政治与经济的交汇点,周边国家对于南海主权的争夺变得日益激烈和复杂。国际上也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南海问题的重量级学者,他们从南海的历史考察、法理依据和合作方式等方面入手展开了深入讨论。

最早从历史和地理角度客观研究南海问题的代表是德国学者迪特·海因策。他在1976年发表的关于南海岛屿纠纷的著作中,非常详细地勾画了南海的地理状况,并从19世纪末开始回顾了南海纠纷演变的过程。^②他的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开始对南海投入了更大的关注。80年代,美国学者马温·S.塞缪尔斯从古代历史上南海岛屿的归属、二战前后各国围绕南海岛屿主权的斗争以及中国的海洋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南海争端问题的由来及各国对涉事岛屿主权的诉求。^③其著作在对南海问题进行历史回顾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这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一系列讨论。日本学者浦野起央的《南海诸岛国际纷争史》是外国学者中关于南海争端历史研究较为权威的著作,该书对南海诸岛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海洋资源、纷争由来和各国主张都做了深入分析,兼论历史上外部势力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并客观地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④挪威奥斯陆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斯坦·汤尼森更是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分析了近代以来欧洲在亚洲地区实力的衰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南海问题的发展进程。^⑤可以说,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学者,尽管有不同的研究重心,但都力图还原南海争端的历史影像,以期从源头上找

① “西方学者”在本文中大体表示西方南海问题研究群体的一种集体身份。他们在南海问题上多持共同或相似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

② Dieter Heinzig,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acels—Spratlys—Pratas—Macclesfield Ban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③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Publishing Ltd, 1982.

④ 浦野起央《南海諸島國際紛爭史: 研究·資料·年表》,刀水書房,1997年版。

⑤ Stein To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No. 1, 2006, pp. 1—57.

出南海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了找到解决南海纠纷的出路,西方学者纷纷提出了法律解决的方案。美国东西方中心的马克·J·瓦伦西亚是世界上著名的国际法专家,也是从国际法角度研究南海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他出版了一系列涉及南海问题的国际法著作。^①他与美国法学家范·戴克等人以南海岛礁的自然地理状况为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南海区域的划界要求,分析了南海周边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及各自划界方案存在的问题,并且比照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争议海域资源开发和管理的 ways 方法,探讨了多种资源分享方式的可能性。^②但是一些西方学者针对这些划界方案提出了质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海洋划界专家维克托·普雷斯科特非常关注声索国可以声索的范围,论述了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领海划界以及专属经济区划界中的要求,并从海洋法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划界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他认为应该首先将南海各国划界区域分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以及通过建立互信解决两大类,然后才能从新的技术角度讨论各国的划界问题。^③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在积极寻求“共同开发”的途径。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瓦伦西亚就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主持了“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研究项目,西方学者从那时起就开始寻找南海共同开发的可能性。^④之后,各种各样的方案被纷纷提出。瓦伦西亚就提出建立“共同使用区”,并成立南沙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⑤北欧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基维马基等人提出建立“海洋公园区”,在其中禁止一切经济活动,仅作为鸟、鱼和海龟的自然保护区。^⑥从法律角度出发的学者大都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总希望将南海问题缩小为一个法律事件,通过遵循已有的国际法,或者提出新的法律倡议,来化解矛盾。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尽管各国纷纷表示对国际法的重视和尊重,但往往从本国利益出发,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诠释,乃至得出与国际法学者截然相反的推断,国际法成为南海问题复杂化的重要推手。

20世纪90年代,对南海共同开发的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也从实践层面逐步展开。从1990年开始,在加拿大等国的资助下,南海相关国家和一些区域外国家召开了每年一届的“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积极探讨在争议区实行共同开发或

^① Mark J. Valencia, *A Maritime Regime for Nor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 J. Valencia, Jon. M. Van Dyke and Noel A. Ludwig,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7; Mark J. Valencia, ed., *Maritime Regime Building: Lessons Learned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Northeast Asi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2001.

^② Mark J. Valencia, Jon. M. Van Dyke and Noel A. Ludwig,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③ Victor Prescott, *Limits of Nation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Academic Press, 1999.

^④ Mark J. Valencia, ed., *The South China Sea: Hydrocarbon Potential and Possibilities of Joint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EAPI/CCOP Workshop East-West Cente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0.

^⑤ Mark J. Valencia, “How to Carve Wat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6, 1996, p. 32.

^⑥ Timo Kivimaki, eds, *War or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2, pp. 153—155.

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系列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各国之间的互信,并对共同开发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总的来看,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本世纪初,在西方地区安全研究中,南海问题研究一直进展平稳,研究路径侧重客观的历史考察,积极寻求增进合作、解决争端的方法。虽然伴随着 90 年代“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南海问题研究的中国指向开始出现,但并未成为主流。

二、南海问题研究升温及其主要原因

从 2009 年开始,南海问题突然升温,成为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焦点。^① 随之而来的是南海问题研究也迅速热了起来,一系列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重新编织了南海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且成为某些国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重要途径。^②

表 1 近年来重要的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统计

主办国家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要议题
越南	2010 年 11 月	河内	南中国海: 区域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合作	1. 国际环境变化背景下南海问题的全球意义
	2011 年 11 月	胡志明市		2. 国际环境变化背景下南海问题的地区意义
	2012 年 11 月	河内		3. 南海局势新变化及其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意义 4. 南海的合作构架 5. 南中国海合作: 经验与前景
美国	2011 年 6 月	华盛顿	南海海洋安全国际研讨会	1. 南海相关各方利益与政策
	2012 年 6 月			2. 南海问题的最新进展 3. 当前南海航行安全机制与框架的有效性评估 4. 加强地区安全的政策建议

^① 2009 年 2 月 17 日,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5 月 6 日,马来西亚与越南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他们各自在南海南部 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5 月 7 日,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在南海中部部分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案”。其后,又出现了越南政府任命西沙群岛主席、马来西亚领导人登陆南海争议岛礁宣示主权等事件。而美中两国在南海海域出现了“无暇号”事件。

^② 邓应文《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兼论其与越南海洋经济战略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32 页。

(续表)

主办国家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要议题
菲律宾	2011年7月	马尼拉	南海: 为了地区的和平合作与进展	1. 南海局势最新进展的评估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意义 2. 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 3. 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南海合作
马来西亚	2011年12月	吉隆坡	南海问题的新进展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含义	1. 南海问题最新进展: 不同的视角和出路 2. 海洋安全与海军外交的角色 3. 南海问题的前景: 不同的选择及其含义

这些国际会议尽管很多是由南海周边国家倡议、组织并在其国内召开的,但在会上往往是西方学者表现得更为活跃。以2011年越南主办的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例,在31位发言学者中,将近一半来自西方学界。他们在会上积极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几乎成为会议的主角。

为何南海问题会再次升温,并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研究的热点?综合西方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

西方国家对其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带来的潜在的海洋冲突早有论述。马温·S·塞缪尔斯指出,南海问题同中国在亚洲转变的大国角色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为了成为海洋大国采取了新的范围更广的强硬的海洋政策,当代海洋争端会与中国海洋力量的不断壮大密切相关。^①在2009年开始的这一波南海问题研究中,中国因素经常被提起,所谓中国“自以为是”(assertive)和“侵略性”(aggressive)成为南海争端复杂化的“主要诱因”。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中美之间的“无暇号”事件主要反映了中国在海军现代化问题以及在寻求南海油气资源上的“自以为是”。^②美国官员对中国在南海“侵略性”行为的指责也成为西方学者的主要引述对象。^③

澳大利亚著名的南海问题专家卡尔·塞耶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自以为是”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1)北京力图向河内施压,使其接受南海油气联合勘探生产协议;(2)中国意图向越南发出信号,强烈反对美越加深安全合作;(3)北京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和本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意识到保护南海航道安全的

^① Marwyn S. Samuels, “Contes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p. 117.

^② Micah Springut, “Managing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orld Politics Review*, July 27, 2009.

^③ “China Taking ‘More Aggressive’ Stance at Sea: US Admiral”,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July 24, 2010.

重要性。”^①而在华盛顿,关于中国南海政策的解读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 中国南海的这些行动是在美国国内经济面临困难时对其意志力的试探;(2) 相对于南方近邻来说,中国的行为是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中国过去以实利为诱惑苦心经营的与东盟的关系正在得到回报,现在许多东盟国家都对中国的举动保持缄默;(3) 中国在该地区的长远之计没变,只是中国现在自信有能力将南海问题公开化,并在与美国的讨论中拒绝将其目标清晰和固定化;(4) 中国现已与越南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端,错误估计了越南将美国和绝大多数东盟国家拉入争端的能力。^② 这些西方学者的解读大部分都围绕着中国崛起带来的资源需求、军力扩张、理念变动等方面展开,其中带有深深的“中国崛起威胁论”的意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的南海问题研究中,关于中国“核心利益”的争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核心理题。在越南召开的第二届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各国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向中方学者发起了多轮提问和指责。瓦伦西亚就指出,“中国拒绝马来西亚和越南外大陆架建议,并将南海归为核心利益等行为,都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外交机会,并使得东盟各国更加靠近美国。”^③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将南海问题提升为“核心利益”这是其南海政策的一大调整,是“自以为是”的最好例证,也是导致南海地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之一,因此应该尽快对华施压,逼迫其澄清在南海问题上的最新立场。

(二)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此轮南海问题研究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南海问题升温的美国因素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与当前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及中美关系的反思有关。

在政策层面,美国国内从2009年开始,积极干预论者的政策呼声日益壮大,美国现行南海政策出现微调迹象。^④ 在2010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希拉里宣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开放进入亚洲公海水域和遵守国际法,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希拉里表示,美国“将乐意促成关于该问题的多边会谈,以形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⑤ 此后,美国高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2011年7月,希拉里再次呼吁“各方用符合国际法的表述方式来明确自己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张。”“对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诉求应该完全出于针对地形地貌的合法诉求。”她

^① Carl A. Thay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2, Winter 2010, pp. 81—83.

^② Bronson Percival, “The South China Se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Tran Truong Thuy, ed.,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a Region of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he Gioi Publishers, 2011, pp. 41—42.

^③ Mark J. Valencia, “The South China Sea: Back to the Future”, in Tran Truong Thuy, ed.,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a Region of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 83.

^④ 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第7页。

^⑤ Whitlock, Craig, “The U. S. Has ‘National Interest’ in Asian Sea Dispute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2010.

建议相关各方应该根据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阐述各自的诉求。^①

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在南海争端日益突出的同时,美国多次强调自己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并主动帮助一些东南亚国家寻找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这固然有美国宣称的航道安全、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契合美国亚太的“战略枢纽”。按照卡普兰的说法,“东亚可以被大体划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区域,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区的核心,而在东南亚地区的核心则是南海。”“在未来的 10 年里,争夺西太平洋的主导权将决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②他还将南海称为“海上欧亚大陆的中心”。^③可以说,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一方面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另一方面起到了防范、遏制中国的作用,强化了其在东亚地区维持领导地位的目标。此次南海争端中,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和政策都趋于强硬,这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正如帕西瓦尔所说,“南海也许不是中国战略意图和美国亚太政策一贯性的试金石,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南海问题的升级是件好事,可以帮助美国强化亚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④

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的战略研究中,美国战略调整是重要的研究议题。而这种战略调整同南海问题升温息息相关,将南海问题置于美国战略调整的范式之下进行探讨,已成为西方学者重要的研究取向。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南海问题是导致中美“战略互疑”的重要安全议题,国际学术界也试图从南海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入手推动中美之间互信的建立。^⑤

(三) 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当前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国际学术界开始从能源安全角度审视南海问题的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南海海域油气储藏前景被公布以及国际石油危机,实为推动南海争端出现、南海问题研究逐步展开的重要原因。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能源需求的竞争性是导致 2009 年以来南海问题再次升温的重要诱因,而如何在保证各国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合作也成为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亚洲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油气资源作为支撑,能源安全成为西方安全研究的新领域。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远期分析认为,从现在起到 2025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预计将平均每年增长 3%。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这

^① “Clinton State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22, 2011,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1/07/20110723125330su0.9067433.html#axzz1cHoDDowt>.

^② Robert D.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 76—85.

^③ *Ibid.*, p. 80.

^④ Bronson Percival, “America ‘Returns’ to Asian: the South China Se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operation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Hanoi, Vietnam, November 3—5, 2011.

^⑤ 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 S.-China Strategic M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 4, March 2012.

些国家的原油需求将从 2002 年的 1510 万桶/天上升到 2025 年的近 3360 万桶/天。^①而根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的统计,南海石油蕴藏量达 418 亿吨,天然气蕴藏量约为 7.5 万亿立方米。巨大的油气资源,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使南海问题各方更加关注在南海的能源利益。

因此,能源角度也成为此轮南海问题许多研究的切入点。学者们认为,2008 年金融危机到来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日益上涨,各国在南海的勘探活动随之增多,从而导致南海争端复杂化。中国和东盟的声索国都积极吸纳一批国际公司,对其各自所主张海域的能源储备进行开采,满足各自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②与此同时,随着各国深海钻探技术的提升,新的油气资源不断被发现。有学者就指出,新的油气资源的成功勘探使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出现了争议。^③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的罗杰斯直截了当地分析了自然资源如何影响到区域内国家的对外行为,他认为南海地区许多国家并没有将资源竞争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框架下来考虑,因此它们之间很难进行合作。只有区域各国加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合作,才能推动南海地区的和平竞争,确保地区稳定。^④

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也同样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指出,由此引起的中国同相关国家之间的能源竞争加大了南海形势的复杂性。^⑤美国海军学院的彼得·达顿更是将南海的资源占有视为中国南海政策三大目标之一。^⑥

三、当前南海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及方向

南海问题研究带有很强的政策取向,与一定时期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密切相关。新一轮南海问题研究除了延续传统的历史和法律的研究路径之外,伴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议题。

(一) 南海地区的制度建设

2002 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作为迄今南海地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新一轮南海争端的

① 《南海宝藏》,《中国经济周刊》2012 年第 12 期。

② Leszek Buszynski and Iskandar Sazlan, "Maritime Claim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9, No. 1, April 2007, p. 156.

③ Ian Storey,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mplications of the Reed Bank Incident", *China Brief*, Vol. 11, No. 8,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6, 2011.

④ Will Rogers,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Patrick M. Cronin, ed.,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012, pp. 83—94.

⑤ Leszek Buszynski, "The South China Sea: 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 S. -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2, pp. 141—143.

⑥ Petter Dutton, "Three Disputes and Three Objectiv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4, Autumn 2011, pp. 56—57.

不断复杂化,DOC的作用在逐渐下降,西方学术界开始考虑在南海地区建立约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导方针达成一致,大大缓解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为建立更具法律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铺平了道路。塞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仔细对比了2005年中国和东盟国家提出的指导方针草案和2011年指导方针的最终版本,提出“指导方针”只是暂时性的安排,不带有法律约束力,是东盟国家逼迫中国加快COC谈判的权宜之计。^①不过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为了南海地区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制度性的安排,特别是COC,是非常有必要的。

挪威的汤尼森就非常重视COC的作用。他认为,此次南海问题最大的变化是DOC的约束作用不复存在,各国已经不再严格按照DOC行事。如果DOC能得到全面遵守,许多事件也许根本不该发生。因此他提出,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迫在眉睫。而这种建立行为准则的尝试应该和为海洋划界营造良好的初始条件的努力相结合。如果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不仅仅作为维持现状的条件,而且着眼于海洋法的实施,进而促使海军部门、渔民组织以及石油机构积极参与到行为准则的制定之中,并最终建立互信,那么它将发挥持久的影响和作用。^②

可以看出,在建立南海制度性安排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与东盟国家有分歧,普遍支持东盟有关国家的立场,希望尽早建立COC,从而用制度建设来约束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二) 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决

这是南海问题研究的传统路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受其法律传统和观念的长期浸染,近两年在国际法方面的成果非常多。

尽管是传统研究路径的延续,但此次南海问题法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希望利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有关。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接受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的仲裁,另一方面试图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说明中国传统“九段线”的不合理性。比利时法学家埃里克·弗兰克就提出“就国际法而言,‘九段线’或‘U线’缺乏坚持的基础。如果坚持将‘九段线’或‘U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会产生严重问题。坚持‘九段线’的主张也违背了现存的研讨、建立互信、以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治理机制。”^③汤尼森也指出,“如果中国希望对整个‘九段线’之内的区域拥有主权,那么将同国际法相矛盾,或者说

^① Carl A. Thayer,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plomacy, Legal Regimes and Realpolitik”,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opical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East Asia,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April 6—7, 2012, pp. 2—6.

^② Stein Tonnesson, “No Maritime Security without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SIS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ne 20—21, 2011, Washington, pp. 4—5.

^③ Erix Franckx and Marco Benatar, “Dotted L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ishing for (Legal) Clarity”, in Tran Truong Thuy, ed.,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a Region of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 230.

干脆彻底推翻国际法,而这必须征得其他国家的同意。”^①可以说,在这一轮“南海热”中,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反复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究其原因,这种方式最容易占领“道义制高点”,在政策上得到民众的支持,在舆论上构建中国“不守法”的负面形象,从而为自身的战略目标服务。

(三) 南海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

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升级,未来南海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建立东亚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也是国际学术界热议的焦点。

一方面是建立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2011年6月,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出台了题为《危机和信心:印度—太平洋之亚洲的主要大国与海洋安全》的报告。报告指出,各国在南海上的边缘政策有可能将地区大国和美国拖入冲突之中。^②因此报告建议,应该在多边安全论坛上更加重视海洋安全,并建立一种危机管理和协作机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葛莱仪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提出,未来南海地区存在三种冲突的可能性——中美在中国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中菲在黄岩岛以及中越在南沙地区,她建议中美之间建立降低风险机制和互信机制,比如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海上演习,以增加中美双方的合作,预防冲突的发生。^③

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瑞典学者拉姆西斯是研究南海地区冲突管理的专家,他通过分析在东南亚地区业已存在的许多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和安全合作机制,比如众多的联合发展安排(JDA)和建立信任措施(CBM),对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提出了建议。他认为,1992年《东盟关于南中国海宣言》和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使各方保持克制并努力寻求彼此争端的和平解决,强化危机管理,增进共同利益,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成为各方共识。而现在南海地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安全困境,未来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④

当前南海问题的波澜起伏为危机管理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现实案例,各种提议也为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但是,这类研究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逻辑,即将中国视为未来南海冲突的主要诱因,并希望就此“对症下药”。

(四) 南海问题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作为南中国海问题的重要一方,其南海政策的演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瓦伦西亚早在90年代就专门分析了中国的南海政策并对政策演变进行预

^① Stein Tonnesso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rvard Asia Quarterly*, Winter 2010, Vol. XII, No. 3&4, p. 23.

^② Rory Medcalf, Raoul Heinrichs and Justin Jones, “Crisis and Confidence: Major Powers and Maritime Security in Indo-Pacific Asia”,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1, pp. 22—23.

^③ Bonnie Glazer, “Armed Cla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2, pp. 4—5.

^④ Ramses Amer, “Dispute Settle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sessing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ran Truong Thuy, ed.,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a Region of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p. 267—268.

估,论述了中国的政策主张、采取的行动,回顾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东盟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关系。^①在2009年南海问题再次升温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与南海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尤其是侧重从内政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国内权力的转移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也是南海局势紧张的重要原因。比如,葛莱仪指出,“中国处于领导权过渡时期,其极端民族主义给国家构成了一种挑战。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转移其在国内承受的压力。”^②帕西瓦尔更是将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称为“增量帝国主义”(incremental imperialism),认为这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就会显现。^③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中国政府机构对南海政策影响的角度做文章。国际危机组织在2012年4月出台了题为《搅动南中国海》的研究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不同的海事管理机构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诉求,提出“九龙闹海”是导致中国在南海地区政策强硬且缺乏连贯性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现在缺乏有效协调这些机构的能力,而未来南海问题的走势也和中国国内协调密切相关。^④

在研究中过分强调中国因素,与普遍强调中国是此次南海问题升温的主要原因有关,而这些特点鲜明的“去中心化”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也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热衷于分析中国外交与内政之间关联性的趋势一致。^⑤

四、对中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启示

南海问题研究作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08年开始的新一轮南海研究热潮,新的视角不断出现,旧的路径进一步深化,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南海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山之石,知己知彼,回顾和总结这些成果,对中国南海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于南海问题的历史阐释和法律解读。在南海历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新的进展不多,大部分史实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专门组织人员对史料进行新的发掘,收集对其主权有利的证据,在国际上发表文章,试图获得舆论支持。而从国际法角度看来,各国学者纷纷提出新的概

① Mark J. Valencia,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Bonnie S. Glazer, “Tensions Flare U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SIS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ne 20—21, 2011, Washington.

③ Bronson Percival, “Dangerous Waters: Exercise Cautio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SIS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ne 20—21, 2011, Washington.

④ “Stirring Up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pril 23, 2012.

⑤ 参见 David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念来表述对于未来南海划界问题的看法,有很多是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标服务的。当前的南海问题,至少从学术角度来讲,已经国际化,这就需要我们的南海研究也得做到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程度。具体来说,国际学术界普遍对中国的“九段线”存在质疑,许多研究成果从历史和法律角度证明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这一倾向需要引起中国南海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中国的“九段线”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但是需要运用现代学术语言进行重新阐释。

第二 提出南海合作新倡议,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经常探讨如何开展合作,化解南海困局。近年来,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建立南海共同渔业区、建立互信机制和冲突管理机制等倡议。虽然很多倡议落实起来难度很大,但仍为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些思路。中国一直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积极倡导者,学术界更应该在如何落实共同开发问题上加强研究。迄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比较有限。比如可以探讨如何将泛北部湾合作的模式推广到南海其他地区,如何进行非传统安全尤其是保证南海航道安全方面的合作,增进国际学术界的共同理解。

第三 推动南海各国战略的比较研究。南海问题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需要同南海局势的发展及各国的战略考量紧密联系起来。只有带着一定的战略取向,南海问题的研究才能更实在。如今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南海战略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深入,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和分析框架,来判断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而我们在此次南海争端中很多国家的战略还把握不准,尤其缺乏一种历史分析的纵深,往往流于就事说事,少有战略走向上的预判和前瞻性。同时,还应加强对各国南海战略和政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应该从美、越、菲等主要国家入手,对于整个南海的战略态势进行宏观、全面的把握。

总而言之,在当前南海研究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亟待出现中国话语。通过学术上的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当前的南海困局,找到推动南海问题走向和平合作解决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陈志瑞)